

英国传教士对晚清鸦片贸易的态度与行动

陈才俊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新研究所教授,510632 广州,中国)

摘要:19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来华。因为各种缘故,大多数英国传教士最初都对当时英国商人猖獗的鸦片走私活动保持沉默。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传教士才更清晰地看到鸦片对中华帝国及其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更清醒地认识到英国政府乃是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纷纷揭露鸦片对人身与灵魂的摧残,公开谴责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性,积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在中国广泛开展鸦片戒治活动,在英国国会大力推动终止对华鸦片贸易的动议,并最终促成英国取消对华鸦片贸易。

关键词:英国传教士、晚清、鸦片贸易、鸦片戒治

作者: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新研究所教授;电子邮箱:chencaijun88@gmail.com

1807 年,英国第一个,同时也是 19 世纪最早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机构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俗称“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打开中国的传教大门。然而,当英国传教士们来到中国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与他们如影随形。其后,英国政府更是以武力逼迫晚清政府签订保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约。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有悖于人类的基本道德,更为基督宗教伦理所禁止,并严重阻碍福音的在华传布。早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因为各种缘故,除个别人外,大多数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鸦片走私活动保持着沉默。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传教士才更清晰地看到鸦片对中华帝国及其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更清醒地认识到英国政府乃是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纷纷揭露鸦片对人身与灵魂的摧残,谴责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性,并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在中国广泛开展鸦片戒治活动,在英国国会大力推动终止对华鸦片贸易的动议,并最终促成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之终结。

一、英国传教士对晚清鸦片贸易的态度

18 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生丝、茶叶等商品的需求量日趋增加,而其工业产品在以自然经济占为主导的中国却乏人问津。为扭转必须以现银抵消贸易逆差之劣势,英国商人便大量向中国倾销败坏中国财政、荼毒民人肌体之鸦片。1757 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97 年,该公司又垄断印度罂粟种植和鸦片制贩权。在东印度公司的操纵下,英国对华鸦片贩售数量激增。1834 年,英国政府收回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营权,东印度公司没有了可能影响其在华其他贸易之顾忌,越发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1839 年,英国政府无视鸦片贩售违反中国禁令,更以武力支持和保护鸦片商人的不法活动,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8 年,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直接控制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制造,并再次借助武力强迫满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规定:鸦片作为“洋药”“准其进口”,“遵行纳税贸易”,可以在各开放口岸销售。^①这样,英国商人的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便得到条约保护而成为“合法”贸易。自英国商人

^① 余英士等著 Wang Tientsin:《中外旧约汇编》Zhongwai jiu yue huibian [A Collection of Old Treaties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第一册, (北京 Beijing: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116 - 117.

对华输入鸦片之日起,英国商界人士自身对鸦片的性质和走私鸦片的道德问题,便存在激烈的争议。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争议,出现在了传教士在华创办的英文月刊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上。1836年,一位名叫 J. C. 斯图尔特(J. C. Steward)的基督徒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鸦片贩售的非道德性。作者认为,鸦片伤害人的智力与消化力,甚至败坏道德。鸦片使人上瘾,吸食鸦片有违《圣经》的教导;卖鸦片给人,如同助人做不道德的事情,实在违背《圣经》爱人如己的立场。文章呼吁福音传播者和教师,不可对事件保持缄默,而是要站出来指责国家的罪恶。作者强调指出,“我们正在积蓄罪恶。这种鼓励鸦片贸易的行为,事实上,是其中最恶毒将愤怒倾倒在人身上的黑暗罪恶。福音的传道人在哪里?共同的人性灵魂流到哪里?这种罪恶到此刻还没有受到谴责?噢!什么样的不幸才会唤醒你的懊悔和同情?那个垂死的、可怜的鸦片受害者能否触动你的灵魂?想想那千万个因此要灭亡的人,然后问问你自己,这样的罪恶到底要持续多久,何以基督教回家里没有一个人关心此事?到底还要多久,英国政府才不再同流合污地干这种卑劣又侮蔑的错事?到底还要多久,英国商人才赚够这血腥的利润而满足,才不怕因为如果他们不下,有人会取而代之?”^②

J. C. 斯图尔特的文章很快便遭到一些侨居广东的、自称“基督徒”的英国商人们的反对。有位既向中国人派发福音小册子,又走私鸦片的“基督徒”詹姆斯·英尼斯(James Innes),便为自己贩卖鸦片的行为予以辩护。他说:“鸦片贸易可以给印度政府提供税收,带来强人的经济利益以造福人群,这已经是合乎道德了。而且鸦片并未被人滥用,鸦片不过如酒一样作药用,既安全又普遍。合法买卖鸦片才能防止滥用鸦片。以资本雄厚、技术高超的政府销售鸦片,总比把鸦片交到地痞恶棍手中买卖要好。”^③詹姆斯·英尼斯在其文章中还特别强调,英国的教会均对鸦片贸易保持沉默的态度。^④

然而,詹姆斯·英尼斯为鸦片贸易辩护的文章很快便引起其他在华基督徒的反驳。A. S. 基廷(Arthur S. Keating)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批评道:“以雄厚资本和高超技术的政府贩卖鸦片,和以暴徒恶棍贩卖鸦片,本质是一样的。批发和零售毒品,本质也是一样的。另外,外国人只看到中国政府不履行国际法和国家互惠原则,却没有看到自己经营不法的事业,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⑤

伦敦会是英国第一个、同时也是19世纪最早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机构,但研究者在相关史料中,却难以觅见该机构对鸦片走私活动所作出的回应。自1807年伦敦会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至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英国来华传教士虽目睹鸦片走私活动及鸦片泛滥成灾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祸患,但大都保持沉默,甚少发表评论。^⑥当然,也有极少例外者。1835年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友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即是其中的“另类”。麦氏早在其1838年出版的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中国:现状与展望》)一书中,便揭露鸦片之害以及鸦片贩售的不道德性。友都思目睹鸦片于人之害,看到其不仅损害人的体力,耗尽吸食者的钱财,更让那些瘾君子良心麻木,意志丧失。所以,他认为,一切与鸦片贸易的瓜葛都是不道德的。“那些种植、售卖和运送鸦片的人,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给那些清白无辜的、信奉异教的人们提供鸦片作为吸食之用。”^⑦友都思还明确指出,传教士若与鸦片售卖活动牵连在一起,必然种下恶果:首先,中国人会控诉基督徒贩卖鸦片,如此中国人很难不轻视传教士的品格和他们所传的教义。其次,传教士若乘坐鸦片船只,他就很难在这有关鸦片贸易的事情上置身事外,因为中国人常会问船上是否有鸦片,还会问价钱。其三,若鸦片船的船长与船员

② J. C. Steward, "Remarks on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November 1836), 305.

③ James Innes, "Remarks on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December 1836), 368.

④ Ibid.

⑤ Arthur S. Keating, "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January 1837), pp. 413-418.

⑥ 有关早期英国来华传教士对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保持沉默的原因,参见黄哲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gjiaoshi yu yepiannan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青洲出版社 Kowloon Chulansha [Missionary Press], 2004), 11-15.

⑦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1838), 360.

为传教士提供了方便,传教士就有欠于他们。于是,他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就难以坚持。其四,每一桩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混在一起的事件,都会成为给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撑腰、削弱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⑧ 1855年,麦都恩又在 *North 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 上发表文章,公开谴责鸦片走私活动。^⑨

然而,在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贩卖鸦片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国内的教会和传教机构却一直保持着沉默。英国的福音派教会大都支持政府的行动,并未反思英国的行为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⑩ 对于英国政府为保护鸦片商人而出兵征讨中国,以及迫使中国签订保护鸦片贩卖的《天津条约》,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均未持异议。相反,当英国元首提出要对付使英国荣誉受损的中国政府时,却迅即得到教会的支持。^⑪ 即便在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各教会亦对鸦片贩售视若无睹,置若罔闻。^⑫

英国教会对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的谴责,至1857年——也就是《天津条约》签订前一年,才公开出现。这一年,离中英两国因为鸦片售卖发生战争已有17年之久。^⑬ 是年,面对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亦译“英行教会”)领袖约瑟夫·里奇韦(*Joseph Ridgeway*)在该会出版的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教会传教情报员》)刊物上,公开谴责英国政府强迫推行鸦片贸易的不道德行为。^⑭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国内的教会、传教机构以及在华的传教士才逐渐打破沉默,公开揭露鸦片的危害,明确反对鸦片贸易。

二、英国传教士与晚清鸦片戒治活动

1858年《天津条约》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前,便有少数传教士在中国开展鸦片戒治活动。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俗称“美部会”)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更是此项活动的开拓者。^⑮ 1839年来华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魏林(*William Lockhart*),则是英国最早在华从事鸦片戒治活动者。他先后在澳门、定海、上海、北京等地开设医院,治疗不少鸦片瘾患者。魏林根据临床实践,撰写治疗鸦片瘾患者的医疗报告。他在医疗报告中所记载的染上鸦片瘾的人数,与伯驾所记载人数的大致相同。至1850年,要求戒治鸦片瘾的人数和求治其

^⑧ *Ibid.*, 361-365.

^⑨ 参见黄智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n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20.

^⑩ *Ibid.*, 9.

^⑪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 Its Men, and Its Work, Vol. II*,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301.

^⑫ *A. I. Droomhall,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Survivors' Pac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and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84), 219.

^⑬ 参见黄智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n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9.

^⑭ See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 Its Men, and Its Work, Vol. II*,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469-470.

^⑮ 参见陈才俊 *Chen Caijun*:《基督教传教士在华鸦片戒治活动研究》*Jidujiaojiao chuanjiaoshi zhihua yapian jiezhi huodong yanjiu* [A Study o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ctivities on Abolishing Opium Habits in China], 载李灵 *Li Ling*、曹庆豹 *Cao Qingbiao* 主编:《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Zhongguo xiandaihua shiyexia de jiaohui yu shehui* [Churches and Socie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221-222.

他病症的人数相对增加。在上海的教会医院,一年内有9382位求诊者,其中约400位是来治鸦片瘾的。魏林和伯驾都没有把鸦片瘾患者和其他病患者分开治疗。^⑧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治疗鸦片瘾患者的方法,没有前例可循,惟靠临床经验。应该说,由于诸方面条件所限,1858年前传教士在华的鸦片戒治活动尚属起步阶段,不仅戒治环境尚不成熟,而且戒治方法有待摸索。至于其戒治效果,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1858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ames Bruce)在天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庭不得刻待禁阻。”第十二款规定:“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和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掇。”^⑨嗣后,两国于11月8日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⑩至此,英国实现了利用武力迫使中国“福音传播自由化”、“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目标。

然而,西方传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亲历,使他们深谙鸦片祸患给中华帝国及其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对福音传播造成的巨大阻遏,所以,他们很快便发起大规模的反对鸦片贸易运动。特别是1877年5月10日至24日于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将反对鸦片贸易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予以讨论。会议最终形成决议:“第一,吸食鸦片是严重伤害身体、道德和社会的恶行。第二,虽然现在不再禁止鸦片贸易,但它依然严重伤害中国,也伤害印度、大不列颠和其他沾染此贸易的国家。它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猖獗情况,尤其在中国人的心中造成怀疑和厌恶,妨碍基督宗教的传播。本大会深愿鸦片贸易尽快受到压制,鸦片只会作为必要的医药用途。第三,本大会充分理解废除此贸易所要带来的商业和经济困难,也不愿意冒昧地提出任何废止这一贸易的意见和方法,只坚持一如既往的信念:“有道德上的错,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对。”第四,本大会相信,那些在大不列颠反对鸦片贸易的工作者的努力,是目前传播反对鸦片贸易信息的最实际和最有效途径。他们所做的确实有助切断印度政府与种植、生产和售卖鸦片的直接关系,以及粉碎任何想要阻挠中国政府以合法途径去规限、压制吸食和售卖鸦片的企图。第五,最后,本大会迫切呼吁基督宗教国家所有教会热切向神祷告,求神使用各种方法,使这人恶得以尽快止息,又使呼吁进入人的耳中,好唤醒英国人以及政府和所有基督徒百姓的良心。”^⑪

1858年以前,来自英国的中国传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医学传教士巴格尔(William Parker)已经在宁波开办医院,展开治疗鸦片瘾患者的活动,但是,1858年之后,才有更多传教士参与协助中国人戒治鸦片瘾的工作。1859年,巴格尔离开中国,将其在宁波开办的医院交由原中国传教会传教士、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管理。当时,该医院一半的病床——约30张,是专门为鸦片瘾患者戒除毒瘾而设立的。^⑫戴德生在治疗鸦片瘾患者方面所做的工作,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根据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海恒博(Alfred James Broomhall)的报告,在

⑧ 参见黄智念 Huang Zhiqian:《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tajiao chuanjiaoshi yu yupianm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25-26.

⑨ 丁钦庄 Wang Tien:《中外旧约章汇编》*Zhongwai jiu yuehang huibian* [A Collection of Old Treaties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第一册, (北京 Beijing: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97, 98.

⑩ *Ibid.*, 116-117.

⑪ M. T. Yates & others (ed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472-473.

⑫ See J. Hudson Taylor, *A Retrospect*,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10, 92-93.

1860年1月底之前,戴德生曾经帮助13名鸦片瘾患者戒除毒瘾。继而,又有133人在随后的3个月前来要求协助戒瘾。^①戴德生在该医院工作9个月后,就前往上海,便把助人戒瘾的工作交给高富(Fredrick Foster Gough,亦称岳腓烈,宁波人称其为岳牧师)。^②

在1877年,全中国共有16家由传教士开办的医院,另有24家医疗站(dispensary)。这些医院和医疗站大多为鸦片瘾患者戒除毒瘾,但戒治的成效似乎并不显著。16家医院中,以伦敦教会创办的最多,收纳的病入也最多。^③根据英国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亦译杜德珍)在1867年的报告,他所属的伦敦会设在北京的医院,全年就有5722名病人住院,当中只有124名是要戒除鸦片瘾的。^④1869年德贞的报告再次指出,在1869年前后4年间,共有1.8万名病人住院,其中只有634名是求治鸦片瘾的。^⑤另据一份报告称,一所在汉口设立的医院,1870年之前的14个月内,所收纳的7037名病人中,仅有96名是求治鸦片瘾的。^⑥相对于传教士所报告的中国人吸食鸦片的高比率,要戒除鸦片瘾的人数就显得很稀少了。^⑦至于专门为戒治鸦片瘾而创办的医院,就只有英国圣公会差会在杭州开办的一家。另外,1877年之前,北京也有一家由伦敦会和长老会合办,由华人信徒负责管理的戒烟所。^⑧

当时,凡来治疗鸦片瘾的患者均需住院,只有服务于杭州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W. F. 希勃(W. F. Shearer)不赞成患者离家进院治疗。^⑨每名住院的病人,一般都要缴付一至两元按金,食宿费用从中扣除。^⑩进院者均需马上停止使用鸦片枪,医疗处方是将鸦片溶在水里,混合其他刺激剂给瘾患者服用,继而再逐渐递减用量。有些医生则仍以金鸡纳霜和樟脑作为处方。当时有少数传教士医生表示,治疗鸦片瘾并没有什么特效药,乃是在乎吸食者的节制和决心,但多数人都很重视戒烟的药方。华人信徒尤其看重戒烟药的功效。^⑪1873-1877年间,《万国公报》所载关于鸦片的文章,其内容多是讨论各种戒烟处方。有些人还吹捧自己的处方已令“千万余人戒脱,无有一人戒不脱者,……还可以治百病”^⑫。有些人还借用西医的名字和权威,大推销宣传自己所售卖的戒烟药。^⑬

接触中国的鸦片瘾患者愈久,传教士便愈感其医疗效果不理想。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慕稼谷(G. E. Moule,亦称穆尔)1876年写信给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补充其之前发表的一篇有关

^① See Alfred James Dromhall, *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Hodder and Stoughton and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90, 195-196.

^② 参见黄智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a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shu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67.

^③ See M. T. Yates & others ed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486.

^④ See *Chinese Recorder*, (July 1868), 51-52.

^⑤ See *Chinese Recorder*, (January 1869), 181-182.

^⑥ Se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870), 319.

^⑦ 参见黄智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a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shu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68.

^⑧ 参见《万国公报》第10卷,1878年2月16日,第357页。

^⑨ Se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870), 318-319.

^⑩ Se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869), 263.

^⑪ 参见黄智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a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shu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69.

^⑫ 《万国公报》*Wanguo Gongbao* [Global Magazine] 第10卷, (1877年11月24日), 207.

^⑬ 参见《万国公报》*Wanguo Gongbao* [Global Magazine] 第8卷, (1876年2月5日), 470.

助人戒除鸦片瘾工作的报道时,引述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学传教士的话:“不要把医疗效果说得那么没有保留,……须知道,在这特别的治疗期间,大家会无可避免地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困惑。”^⑧

德贞是一个医术非常高明的传教士,其在此期的戒烟工作中亦十分出色,仅1876年,在他行医的医院就收纳超过1万名病人,其中有许多鸦片瘾患者。当时有华人制造戒瘾药物,更以德贞的名字作为药名。^⑨

自《天津条约》签订至1877年第一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召开,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戒治鸦片活动已初具规模,无论是戒烟所的数量与地域分布,还是接纳的病患人数,均有较大的突破。但是,其戒治效果依然不是很理想。

1888年6月9日至19日,世界新教传教百年大会(Centenary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s of the World)在伦敦举行。应传教士的强烈要求,会议延期1天专门讨论鸦片问题,并最后通过由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提出的议案:“第一,要将贻害中国的鸦片贸易大忌记录下来。第二,谴责英国政府借印度去制造和推销鸦片这种贻害人间的毒物。第三,确认只要政府肯禁绝此贸易,此贸易定能禁绝。第四,呼吁所有英国、爱尔兰等地的信徒齐心合意敬仰上帝。第五,向首相和印度总督转呈此议案。”^⑩1890年5月10日至20日,上海举办第二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由于一些大的差会均以教育、医疗、文字、救济等作为传教工作的重心,所以鸦片问题远没有像1877年大会那样受到重视,仅有内地会提出将拯救鸦片瘾患者作为传教工作的重点。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在华传教士百年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上海举行。传教士们预感到中、英两国有意禁止鸦片贸易,估计会有大量的鸦片瘾患者寻求断瘾治疗,所以,他们呼吁所有在华传教士加强鸦片戒治工作,并通过两项决议:“第一,促请所有在华传教士,尽可能以各种方法打击鸦片这一大恶,同时加强戒烟所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竭尽所能将基督的能力突显成为脱离此败坏的大恶、求得永远救恩的惟一肯定和希望。第二,敦促所有住在中国人中的基督徒齐心协力努力,唤起公众一同反对售卖和反对使用鸦片。”^⑪

传教士在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中,最令千万中国鸦片瘾患者受益的,要算是其创办的戒烟所所提供的戒烟服务。其中又以戴德生及其内地会所做的工作最早和最有效果,有些后来的传教机构也效法他们的工作。^⑫

在1890年之前,传教士在华的反对鸦片贸易工作,只有在治疗鸦片瘾患者方面有点成绩。传教士发现,帮助中国人戒治鸦片瘾,是其接触和传播福音给中国人的最佳方法。所以设立戒烟所便成为传教士的一项重点工作。特别是对于内地会的传教士,其戒烟所大都设在山西太原一带。而戒烟所的涌现则与社会的需求有关。那些设于内地城市的戒烟所,跟附设于沿岸大城市大医院的戒烟所,无论在规模还是设备上,都有很大的差别。^⑬ 根据美部会传教士H. T. 惠特尼(H. T. Whitney)在

^⑧ *Chinese Recorder*, (October 1876), 136.

^⑨ 袁见贵著黄智:《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ni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46.

^⑩ Johnston James, ed., *Report of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s of the World, held in Exeter Hall (9-19 June)*, London, 1888, Vol. I,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88), 471.

^⑪ *Records: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1907*, (Shanghai: 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658.

^⑫ 袁见贵著黄智:《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ni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00.

^⑬ 袁见贵著黄智:《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ni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00-101.

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理想的戒烟所除了要有好看的中式或西式外观外,里面则要设置各样的书刊,还要开设心理辅导服务等等。H. T. 惠特尼这些理想,恐怕只有像伦敦会、英国圣公会差会及美国长老会等几个人宗派的传教差会可以达到,而且亦仅限于沿岸大城市大规模综合性医院内附设的戒烟所。然而,对于大型的教会医院而言,给人戒烟只是其医疗工作的一部分,像伦敦会在全国9家医院的79 365名病人中,就只有209人是治疗鸦片瘾的。英国圣公会差会医院的情况亦大致如此,在36 760名病人中,只有118人是治疗鸦片瘾的。英国圣公会差会还在杭州建立了一所专门治疗麻风和鸦片瘾患者的医院。⁴⁰ 这两大传教差会都没有在内地设立戒烟所,他们的着重点,是在大城市里发展全面的医疗和教育工作。

当时在华设立最多戒烟所的传教组织是戴德生领导的内地会,且其戒烟所大都设于内陆。戴德生刚到中国不久,就开始医治鸦片瘾患者,并因此赢得声名。他每次回英国述职,都在各大教会之间奔走,宣传反对鸦片贸易的信息。他在创立内地会之后,于1878年开始出版内地会刊物*China's Millions*(《中国亿兆》),把对付中国的鸦片之害视为重要问题之一。该刊极少发表议政文章向中、英两国政府诉求反对鸦片贸易,而是常常登载传教士在中国内陆地区所见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的情形,着重助人戒烟和传扬福音。⁴¹ 1876年,内地会只有两家戒烟所;后来逐渐增多,1885年有8家,1886年有13家,⁴² 1893年有28家。⁴³ 内地会的戒烟所和传教士的数目,增幅乃众传教组织之冠。⁴⁴ 及至1905年,该会共设立101家戒烟所。⁴⁵ 内地会戒烟所发展迅速、远胜其他差会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该会领导人发现开办医院和戒烟所是当时社会最需要的服务,又是接触中国人的最佳途径。戴德生在1880年代内地会的发展计划里,将戒烟所和医院列为重点工作。他计划在每个传教站开办一个戒烟所,并设立售药站以销售戒治鸦片的药物。他以医院作为训练中国同工的基地,其他内地会的传教士同样抱有这种工作理念和热诚,而且对救助中国人脱离鸦片灾害都有很强烈的意愿。其次,内地会的发展策略是发散式的。传教差会大都集中在沿岸大城市发展大型医院,内地会则将传教站、戒烟所分散扩展到内陆的城市乡镇。从医疗技术和设备看,内地会分散在各地的传教站和戒烟所,当然比不上大城市的大型医院;但从传播福音的效果看,它们却因深入内陆乡镇而能广泛地和百姓接触。最后,内地会的传教士很愿意放手,将管理戒烟所的任务交由中国信徒领袖负责,自己退居顾问的角色,保持合作的关系。这都是内地会的戒烟所之所以能够在山西太原一带发展迅速的原因。⁴⁶

传教士为中国人治疗疾病和戒除鸦片瘾的成效,开始得到一些官员的肯定,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传教士医治过的,或是因为办理洋务而对传教士工作有所了解的人。山西有位将领因为在传教士的戒烟所戒除了鸦片瘾,就推荐其他鸦片瘾患者去找传教士帮忙戒治。⁴⁷ 李鸿章和三位道台亦曾出席天津伦敦会医院的开幕典礼,该医院还是李鸿章出钱建造的,以表达对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教

⁴⁰ See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77.

⁴¹ 袁见赏著黄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opiumm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01-102.

⁴² See *China Millions*, (China Inland Mission, 1886-1887), 80, 84.

⁴³ Se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150.

⁴⁴ 1875年,内地会只有32位传教士,而1885年,传教士人数增加到225位,传教站则由52个增加到106个。

⁴⁵ See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147.

⁴⁶ 参见黄智奇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jiaoshi yu yopiumm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02-103.

⁴⁷ See Mrs. H. Taylor, *Pater Hic: Confucian Scholar and Christian*, (London: Morgan & Scott, 1923), 219-220.

活其妻子的感激。⁶⁰此外,在南京有 13 位官员支持兴建教会医院,并在院内附设戒烟所。⁶¹可见,传教士设立戒烟所的做法,开始获得一些中国官员的肯定。中国政府随后也开办戒烟所,而第一家官办的戒烟所开设于 1880 年冬。⁶²

1890 年前后,戒烟所的发展最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当地方政府雷厉执行禁种禁吸鸦片,或者鸦片瘾患者到了一穷二白的时候,戒烟所便成为吸食鸦片者最有可能选择的地方。中国政府和民间自办的戒烟所不多,成果也不显著;因为缺乏跟进的善后工作,所有很多人成了又复吸。⁶³由于中国政府和民间自办的戒烟所难以应付社会的需求,传教士所创办的戒烟所则正好能满足之。传教士们确信,戒烟所的设立,正是一个抗议鸦片贸易的具体行动。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医学传教士梅登毕(Duncan Main)就绝对肯定戒烟所的存在价值,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戒烟所可以让中国人亲眼看到我们的好意。盼望我们可以做些好事,把那些被鸦片捆绑的、被生命中的不幸缠住的……拯救出来。”⁶⁴

英国浸礼会(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华新(G. B. Farthing)牧师 1891 年抵达山西。他也仿效内地会的做法,开设一家戒烟所;因为反映良好,且有中国人因此皈信基督,⁶⁵所以随后几年,他又开设 3 家戒烟所,交由华人基督徒管理。至 1895 年,有超过 600 名鸦片瘾患者在其戒烟所戒毒,⁶⁶甚至有鸦片瘾患者愿意自己出钱到戒烟所戒毒。⁶⁷其他 1890 年之后建立戒烟所的差会,分别有联合长老传教会(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在辽宁和沈阳;美国浸信传教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在四川;英国卫斯理传教会(English Wesleyan Mission);在湖北(他们早于 1880 年代已在广东佛山设立了一家戒烟所);⁶⁸美国长老传教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在山东济南;美国循道传教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⁶⁹和美国归正宗传教会(American Reformed Church);在福建;礼贤传教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在广东东莞;⁷⁰加拿大长老传教会(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在湖南;⁷¹瑞典美国人差会(Swedish American Mission);在湖北的樊城;⁷²瑞典差会(Swedish Mission);在山西解州。⁷³除了以上的传教差会之外,还有英国圣公会差会、伦敦会、美部会这些历史悠久又具规模的传教差会,分别在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开设专门治疗鸦片瘾患者的病房。⁷⁴以上提到的各个传教差会,设立最多戒烟所的也不过 5 家,最少的只有 1 家。然而由内地会设立的戒烟所,1905 年已

⁶⁰ See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10.

⁶¹ See James Johnston, ed., *Report of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nisters of the World, held in Exeter Hall (9-19 June)*, London, 1888, Vol. 1,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88), 134.

⁶² 参见《申报》Shen Bao [Shun Pao], (1882 年 7 月 11 日), 3301.

⁶³ 参见《申报》Shen Bao [Shun Pao], 1882 年 12 月 5 日, 3448.

⁶⁴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893, 192.

⁶⁵ See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80.

⁶⁶ Se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47.

⁶⁷ See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85.

⁶⁸ Se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96.

⁶⁹ *Ibid.*, 220.

⁷⁰ *Ibid.*, 276.

⁷¹ *Ibid.*, 291.

⁷² *Ibid.*, 295.

⁷³ *Ibid.*, 522.

⁷⁴ 参见黄智真 Huang Zhiqi: 《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shiyu yi yu piaopianwang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justice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上海: 福音出版社 Xuefeng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38-139.

增加到 101 所,其中 71 所在山西。⁶⁵ 以治疗鸦片瘾著称的医生,有在杭州的梅登昱,在天津的马根济,在厦门的郁约翰(John Abraham Otte),在北京的 M. D. 普理查德(M. D. Pritchard)和 B. C. 阿特伯里(B. C. Atterbury),在华山的 S. A. 达文波特(S. A. Davenport),以及在烟台的塞韦德(Arthur Douthwaite)。⁶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教士在华设立的戒烟所虽为很多中国人戒毒,但成功能使戒毒者完全脱离鸦片瘾的比率却很低。根据 1896 年的统计,在传教差会开办的戒烟所里接受戒毒的有 1 088 人,其中只有 170 人在一年内不再重吸鸦片。⁶⁷ 传教士把这样低的戒断率,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戒毒者的心不诚恳。二是因为缺乏教牧同工去跟进那些没有真正信心的戒烟者。对于拥有较多传教士的宗派,跟进工作比较容易,也更见成效。内地会有最多传教士,在 1906 年有 849 位。虽然如此,其发展蓬勃的戒烟所却缺乏高素质领导同工。内地会传教士 W. G. 皮特(W. G. Peal)就曾在 *Chinese Recorder* 上发表公开信,反对让一些连基督教信仰都未弄清楚的人负责管理传教士的戒烟所,主张戒烟所应由传教士管理。他的呼吁说明,当时兴旺的戒烟所可能因人手不足而趋向于让信仰根基尚浅的华人信徒担当领导重任。W. G. 皮特还认为,戒烟所的工作虽然重要,但传教士不应以此作为全部的工作。⁶⁸ 这反映出传教士当中可能有同工因只顾帮人戒毒,而忽略其最为根本之传教目的。⁶⁹

及至 1907 年,传教士设立的戒烟所一直是鸦片瘾患者主要求助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戒烟所仍未普遍。*Chinese Recorder* 的编辑曾经设计问卷,向在华传教士调查各地的禁烟情况。按照传教士的报告,只有福州、天津和广州才有官办的戒烟所,但办得并不成功。⁷⁰ 而满清政府在 1907 年之后,才容许百姓自办戒烟所和禁烟的组织,又只许他们办理有关戒烟的事务,不准议论政治和其他与戒烟无关的事情。⁷¹ 传教士办理的戒烟所之所以如此吸引中国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医疗技术逐步得到中国官方的肯定,也开始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在助人戒烟的事情上,传教士们所做的确实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⁷²

1878-1907 年间,英国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戒治鸦片瘾活动更趋全面、深入,戒治方法亦更为科学、理性。其最重要的成效在于,促进了大量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戒烟机构的诞生。

三、英东禁止鸦片贸易会与晚清鸦片贸易的终结

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在华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传教士极力反对这种罪恶的贸易,并形成共识: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并非那些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而是力主鸦片贸易的

⁶⁵ See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147.

⁶⁶ See James S. Dennis,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New York, Chicago and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9), 129.

⁶⁷ Se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327.

⁶⁸ Se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893, p. 184.

⁶⁹ 参见黄智念著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ta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shang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40.

⁷⁰ Se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906), 119.

⁷¹ 《十二朝东华录之光绪朝》*Shierchao donghualu zhi guangxuchao* [Twelve Dynasties' Guangxu Dynasty] 第十册, (台北 Taipei: 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 [Wenhai Press], 1963), 5575-5577.

⁷² 参见黄智念著 Huang Zhi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tajiao chuanjiaoshi yu yapianshang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140-141.

英国政府。所以,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方式不再只是呼吁商人顾及商业道德,而是重在争取英国国会修改法律。与此同时,传教士一致认为,福音工作在中国难以开展,是因为鸦片贸易的缘故;这个观点持续到以后的几十年。他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反对传教士,是因为传教士是洋人。中国人向来就憎恶洋人,加上被洋人打败,还被强制输入鸦片,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些所谓的基督宗教国家道德水平不过如此,就对洋人传教士所传的道理更加反感。在传教士的心目中,鸦片贸易一日不除,福音工作一日不会同见到光明。特别刺激英国传教士的,是他们以自己的国家参与这种贸易为耻辱。他们的言论大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想法,他们都想除去自己民族的羞耻。^①

伦敦会差派到香港和广东带传教的丹拿(F. Storrs Turner)牧师,对自己国家的行为深以为耻。为了除去自己国家的羞耻,并唤醒英国政府和自己同胞的良心,他不惜辞去在香港的传教职务,回到英国,专心推动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丹拿1859年到中国(香港和广东)传教,1870年后返回英国。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真实惨状告诉英国人。1874年,丹拿出版*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其对印度、中国的后果》)一书。他在书中有条不紊地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鸦片贸易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最后陈明英国鸦片贸易政策所带来的祸害。该书还收录许多不同身份的人所撰写的有关鸦片致害于人的见证,这些论据是当代文献中对鸦片贸易的前因后果描写得最详细的。丹拿撰写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英国成立一个反对鸦片贸易的机构。^②于是,在丹拿的四山奔走下,由曾经来华的传教士发起,旨在推动大规模禁烟运动的组织——英东禁止鸦片贸易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以下简称“英东禁烟会”)于1874年11月14日在伦敦(London)成立。

英东禁烟会虽然不是一个传教组织,但其成员则以教会人士为主。创始人丹拿任执行秘书,实际负责该会的全年工作,且为全时受薪的职员;执行秘书的任务是联系教会和传教士,筹办各地的禁止鸦片贸易会议,处理英东禁烟会的日常会务,包括出版反对鸦片贸易的报刊、书籍和小册子,策动全英国的教会、反对鸦片贸易的人士及组织,联名上书英国国会和外交部。执行董事包括曾经在华传教20多年的维魏林和理雅各(James Legge);副会長是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里彭主教(Right Rev. the Lord Bishop of Ripon);董事会顾问包括在华传教士戴德生、斯蒂文森(John Stevenson)、德贞等及13位来自英国不同宗派的教会领袖,如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G. S. 巴雷特(G. S. Barrett)、J. W. 皮斯(J. W. Pease)等。^③

英东禁烟会将英国国内零星的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并发展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反对鸦片贸易运动。1874年之前,英国已经有两个较小的禁烟会,分别是保护原住民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和压制鸦片走私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Opium Smuggling)。英东禁烟会就是在这两个禁烟会的基础上成立的。^④此后,英东禁烟会更在英国不同的区域成立分支会社,如1882年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成立分会,1880年代末又在格拉斯哥(Glasgow)和利物浦(Liverpool)

^① *Ibid.*, 38, 32-33.

^② See F. S. Turner, *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76), II.

^③ See Alfred James Broomhall, *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Ilodder and Stoughton and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90), 129-140; II. J. Beattie,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Opium in China," *Harvard Paper on China*, Vol. 22, (December 1964), 122, 129.

^④ J. R. Brunen, "Politics of the Poppy: 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1874-191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8, 2, (1 April 1973), 101.

成立分会。^⑧

英东禁烟会成立之后，创办旨在推进禁烟运动的月刊 *The Friend of China*（《中国之友》）。此刊于 1875 年 3 月创刊，直至 1916 年英国立法废止鸦片贸易才停刊，其口号是“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该刊大量登载反映中国鸦片祸患及谴责鸦片罪恶的文章，向英国政府与民众传达鸦片贸易的祸害以及中国人民的诉求，其中有相当篇幅的文章是由在华传教士撰写的。^⑨ 1882 年之前，英东禁烟会已出版发行 14 本书籍和 9 种小册子，论述鸦片贸易及其邪恶性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是海恩波（Benjamin Broomhall）的撰写的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鸦片吸食的真象》）。该书详载传教士和中英两国官员就鸦片问题所作的见证。^⑩ 英国传教士还在出版于中国的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万国公报》（其前身为《教会新报》）上发表大量谴责鸦片危害和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

作为英东禁烟会的创始人和执行秘书，丹拿还联络中国的华人基督徒领袖，鼓励他们在中国成立禁烟会，以传递鸦片害人的反鸦片信息。由于他和广东的信徒稔熟，因此，他的提议一呼百应。时于 1875 年，广州便成立了第一家华人劝戒鸦片社——由广东羊城教会主办的“羊城劝戒鸦片社”。其后，宁波、北京、福州等许多地方，亦陆续成立一些华人劝戒鸦片社。华人劝戒鸦片社成立的目标有两个：其一，向百姓宣传鸦片之害。具体方法是：印发单张，张贴康衢，分派民户；或著成书，藉以颁行。其二，呼吁各省各会的牧师、教师和有名望的官绅兴办禁烟会，并一同联名上书政府，请求立法禁种鸦片，或连同英国禁烟会劝止鸦片贸易，以及请送戒烟的药方药物。^⑪

1881 年 10 月 21 日，英东禁烟会在伦敦禧信楼（Mansion House）举行全英国反对鸦片贸易的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领导此次大会的负责人有：英国国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和贝德福德主教（Bishop of Bedford）、新教的 E. E. 詹金斯（E. E. Jenkins）牧师和 R. J. 辛普森（R. J. Simpson）牧师。全英国有共 11 个教会团体参加此次大会，显示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得到大多数英国主流教会的支持。不少教会领袖得到大会的邀请，在华传教士则有威廉·柯林（William H. Collins）和海恩波出席大会。英东禁烟会的负责人和大多数执行委员都是新教徒，有具政治背景的，也有属于自由党的，他们都为团结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而不分教义和党派。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谴责英国政府对华贩卖鸦片的政策不道德。会议通过四项决议：第一，鸦片贸易违反基督徒和国际的道德，也违反英国国家的商业利益。第二，英国不仅有责任停止鸦片贸易，而且除了医疗用途，不再鼓励印度种植罂粟。第三，英国有责任援助印度减轻其因停种罂粟和停售鸦片所带来的经济困难。第四，大会委派代表进见首相，呈递议案，请予执行。^⑫ 1882 年 3 月 5 日，英东禁烟会再次举行反对鸦片贸易在全国大会。会议邀请 9 位在中国工作超过 8 年的传教士，让他们现身说法，见证鸦片在中国所造成的灾害。^⑬

在英东禁烟会的发动和宣传下，英国绝大多数教会对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大多数教会领袖都曾致函英国国会和外交部，促请停止鸦片贸易。从 1877 到 1882 年，他们写了

^⑧ 参见黄哲奇 Huang Zhe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gjiaoshi yu yapianni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38, 34.

^⑨ *Ibid.*, 42.

^⑩ See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2), 1-4.

^⑪ 参见黄哲奇 Huang Zhe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gjiaoshi yu yapianniao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 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42-43.

^⑫ See W. H. Brewster, *The Truth about Opium*, (W. H. Allen, 1883), 80.

^⑬ See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2), 17-63.

超过 770 封请愿信,收集了超过 57 000 个签名,并将之递交国会和外交部。^⑤ 他们呼吁英国政府停止生产和销售鸦片,以及不要干预中国政府为了抑制鸦片泛滥而高征鸦片税的自由。

英东禁烟会除了联系英国国内教会团体,推动发表反对鸦片贸易的言论之外,同时也积极联络支持反对鸦片贸易的中国官员。该会曾经联系的中国官员,除有先后担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和曾纪泽外,还有时任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郭嵩焘更被邀请担任英东禁烟会的名誉顾问。李鸿章虽然没有参与英东禁烟会,但曾致函该会,表示对该会所付出努力的欣赏,还勉励他们继续致力协助中国脱离鸦片的奴役。^⑥

英东禁烟会成立的最终目的是终结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在声势浩大的反对鸦片贸易的声浪下,身兼英东禁烟会副会长和国会议员的皮斯,连续不断地在国会提出反对鸦片贸易的动议。1880 年 6 月 4 日,他首次向国会发起动议,未被通过;1881 年 4 月 21 日,他再次向国会发起动议,又未被通过;1883 年 4 月 3 日,他第三次向国会发起动议,国会终于通过了动议。然后进行议决,结果 126 票反对、66 票赞同,议案未获通过。1889 年 5 月 3 日,英东禁烟会的另一位国会议员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再度动议国会议决禁止鸦片贸易的议案,结果以 165 票赞成、88 票反对而获通过。虽然英国政府并未因为此次国会有大多数人反对鸦片贸易而修改其对华鸦片政策,但是,它却激起了英东禁烟会更高的反对鸦片贸易的士气。1891 年 4 月 10 日,英东禁烟会会长兼国会议员皮斯,更进一步提出新的动议,要求国会认定鸦片贸易是违反道德的。辩论结果是 130 人赞成,160 人反对。1906 年 5 月 30 日,在英东禁烟会的不懈努力下,国会议员西奥多·泰勒(Theodore Taylor,亦有学者译为戴得道)再次在国会发起动议,要求国会确认鸦片贸易是违反道德的。结果,动议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获得一致通过。1906 年 9 月 20 日,光绪皇帝颁布谕旨,限 10 年内完全废止吸食鸦片,并同时颁布限制吸食鸦片的新规条。1907 年 12 月和 1908 年 1 月间,英国政府开始与满清政府协议,以 3 年为试验期,逐步减少印度鸦片向中国的输入。1911 年 5 月 8 日,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英禁烟条件》。^⑦ 正是因为英东禁烟会及广大英国在华传教士的不懈努力,才最终导致 1906 年英国国会正式确认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性,以及中英两国政府协定逐步禁绝鸦片种植与贸易。

四、余 论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英国在华基督教传教士逐渐认识到鸦片对中华帝国的严重危害,纷纷揭露鸦片对人身与灵魂的摧残,谴责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性,并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在中国广泛开展鸦片戒治活动,在英国国会大力推动终止对华鸦片贸易的动议。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有悖于人类的基本道德,更为基督宗教伦理所禁止。所以,鸦片在中国的出现,无疑引起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普遍反感和愤怒,并严重阻碍福音的在华传布。英国在华传教士竭力反对鸦片贸易,积极展开禁烟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鸦片贸易大都由所谓“基督宗教国家”的人民经营,以致阻碍华人接受基督宗教信仰;二是因为鸦片危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以及中华帝国的财政经济,最终危及英中政治与商贸关系;三是因为英国使用武力将鸦片毒害强加于中国,侵犯中国的主权,使传教士深感愧疚。

^⑤ 参见黄哲奇 Huang Zheqi:《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Yi you renyi, Jidujiao chuangjiaoshi yu yapiannaoayi de douzheng* [Having Kindness and Justice als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Opium Trad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ndao chubanshe: [Missionary Press], 2004), 82.

^⑥ *Ibid.*, 44, 76 - 77, 126 - 127.

^⑦ *Ibid.*, 85, 93 - 94, 121, 134 - 134, 136 - 137.

English Title:

**The British Missionaries' Attitudes and Actions to the Opium Trade
in Late Qing Dynasty**

CHEN Caijun

Ph. D.,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510632Guangzhou, China

Email: tchc@jnu.edu.cn; chencaiJun888@163.com

Abstract: The British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At first, most of the British missionaries, for various reasons, kept silence to the rampant opium smuggling by the British merchants then. Until up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British missionaries just saw more clearly the serious disaster to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her people caused by opium, and realized more soberly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the real culprit of the opium trade. So they revealed the destruction of opium to human body and soul one after another, condemned the immorality of the opium trade in public, and put a great deal of manpower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nto the activities of abstaining from opium poppy in China actively, promoted with utmost strength to the motion of ending the opium trade to China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and contributed the United Kingdom to canceled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finally.

Key words: British missionaries, Late Qing Dynasty, the opium trade, abstaining from opium poppy

